

好看的学术译丛

枕边的人文情怀

【美】罗纳德·阿隆森 著
章乐天 译

加缪和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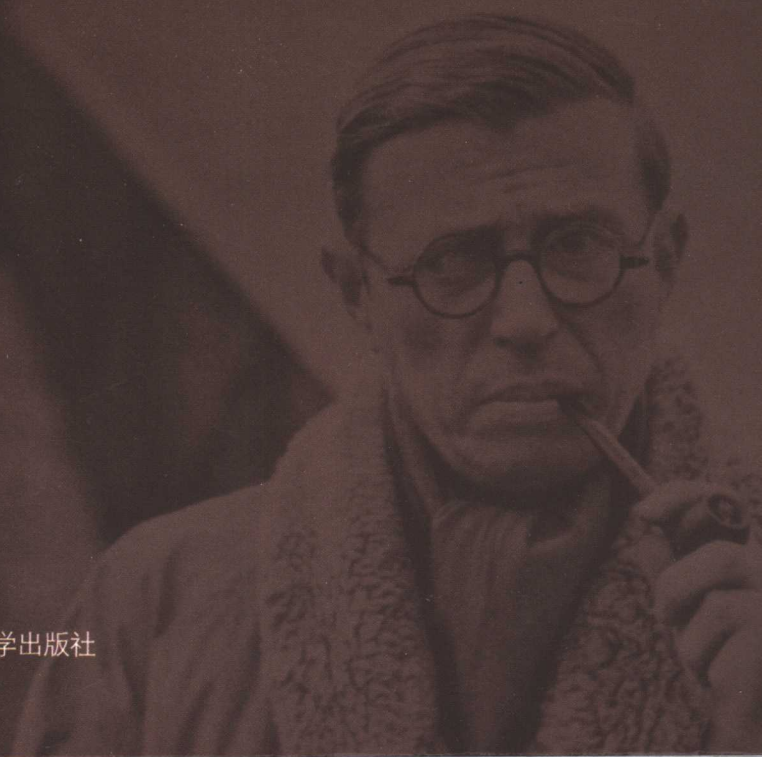
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20 世纪 **欧洲知识界** 的一段 **传奇故事**

两座文坛高山 延续成思想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加缪和萨特

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美】罗纳德·阿隆森 著
章乐天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 (美) 罗纳德·阿隆森著；章乐天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ISBN 7-5617-4232-0

I. 加… II. ①罗… ②章… III. ①加缪, A.—哲学思想—研究 ②萨特, J.P.(1905—1980)—
哲学思想—研究 IV.B5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 034381号

加缪和萨特

——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著 者 【美】罗纳德·阿隆森

策划组稿 彭 伦 许 静

责任编辑 郑英旻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卢晓红

责任出版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刷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05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4月第一次

印 数 1—5100

书 号 ISBN 7-5617-4232-0/B.225

定 价 24.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鸣 谢

感谢史蒂夫·戈林和杰里·托马慧眼从我的草稿里发现了可取之处,用批评兼同情的眼光阅读,并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2001年7月,在克鲁埃,弗朗西斯·让松和我花了三天时间,就他“故事的第三者”的角色认真交流了看法。我得感谢他的慷慨大度以及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安娜·菲利普对菲丽丝和我的热情接待。米歇尔·莱巴尔卡以对 both the large picture and the small 的无与伦比的重视通读了全书。阿德里安·范·登·霍温校对了我的翻译,纠正了许多思想和语言上的不妥之处,并就全书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个人意见。让-皮埃尔·布雷、米尔特·坦博尔和琳达·利伯曼也读了手稿,并给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伊拉·孔尼斯堡及时到来,阅读了关键章节,与我讨论了最后几个重要问题。其他读过全部或部分书稿,并或提出建议或对我的创作计划给予鼓励的人,有朱迪思·埃利斯、大卫·德雷克、大卫·施维卡特、安森·拉宾巴克和里查德·古尔。我与许多人进行过受益匪浅的讨论,他们是恩斯特·本雅明、沃尔克·斯卡库恩、埃里克·伯克斯泰尔和帕梅拉·阿隆森。罗伯特·丹内维思、弗兰克·柯切斯基、卡伦·麦克德维特和查尔斯·鲁尼与我共同审读了校样。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卡罗尔·凯勒不知疲倦地和我一起完成手稿。值得

一提的还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两位优秀的年轻人。从手稿到成书的过程中,初稿编辑拉塞尔·哈珀不辞辛苦地出主意、策划、解决问题。编辑助理伊丽莎白·布朗奇·戴森频繁地用可靠的文学敏感和真知灼见助了一臂之力。我向以上所有这些人表示感谢。

我还想感谢南非德班的纳塔尔大学历史研究会、密歇根州州立韦恩大学人文中心,以及北美萨特学会,我把这本书献给所有这些机构。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很高兴我的一些推论能够发表在《时代文学增刊》上,并在《异议》和《国际萨特研究》上公布我找到的一部分材料。

韦恩大学在其他方面对我有所帮助,供我查阅材料并给予我公休假和差旅资助。它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1992年在一个毕业交流会上,1994年在美国人文基金会为学校教师举办的夏季研讨会上,我可以就一些主题展开讨论,最后形成了这本书。

六年多的时间里,菲丽丝·阿隆森与这个写作计划相伴,用惟有终生伴侣才能具有的热情共同承担。自始至终,她读了全部稿件的每一章节,与我就大大小小所有问题进行了讨论,把该书的风格、语言、节奏、语调都点评了一番。我特别向她表示感谢。

引子

“致《现代》杂志主编……”^①

“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多，使我们分离的事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②

“致主编”：但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挚友在对另一个挚友说话。“如果您断绝了它”：这位响当当的自由哲学家，先把责任推给了他的朋友，然后再兜头泼对方一身暴风骤雨般的侮辱——事实上，正是这种侮辱断绝了友谊。

这些令人难忘的词句，如此私人又如此公开，如此真实可信又渗透着不真诚，预示着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一段私人关系的转折点和一段历史时期的转折点。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在法国解放以后迅速进入蜜月期。两个人和他们的友谊都反映了战后四处弥漫的乐观主义。多年来，即便分歧不断地加深，他们的友谊还是经历了战后清洗、法国殖民战争、国内政治恢复常态，以及最重要的，冷

① 加缪《反抗与奴役》，《论文集》（Paris，1965），页754。

② 萨特《答加缪书》，《处境种种》（New York，1965），页71。

战持续升温的影响和它施加的选择立场的压力。但是,在美苏冲突升级并导致朝鲜战争之际,两人共同投身的中间立场烟消云散了。最后,加缪和萨特劳燕分飞,各奔前程,因为他们选择了相互对立的立场,更因为两人都成了自己阵营的道德和思想领袖。

在一场激烈的哲学碰撞或一场残酷的友朋反目之中,战后法国知识界两大主要声音当着公众的面摧毁了持续将近十年的友谊。起初还心有不甘,犹犹豫豫,后来却急转直下,其势似无可遏制,随着友谊的崩解,萨特和加缪也破坏了他们的政治环境,致使一度是他们共同目标的创建一个独立左翼的计划灰飞烟灭。

这本不像是一个会上演历史大戏的情形:一家发行量略高于一万份的巴黎杂志密密麻麻地刊登了几篇文章。1952年8月号的《现代》杂志很快销售一空,加印,又销售一空。同时,交锋还在另一份日报——加缪曾任主编的《战斗报》——的两页增刊上进行。今天的《新观察家》的前身也集中刊登他俩的信件의摘录。这场绝交成了全巴黎谈论的话题,足有一打报刊的文章在对此进行讨论。头版标题有《周六晚报》上的“萨特—加缪绝交大功告成”^①,有《法兰西画报》上的“萨特 Vs 加缪”^②。主角和他们各自的支持者都认为这场争吵囊括了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他评论加缪《反抗者》的文章中所谓的“我们时代的急务”^③。正如萨特的老校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④指出的,这些文章中包含的分歧“立刻呈现出一场国家级争论的特征”^⑤。当加缪在答让松文中同时攻击让松和萨特,萨特和让松随

① 《周六晚报》1952年9月6日;见赫伯特·R·洛特曼的杰作《阿尔贝·加缪传》(Corte Madera, CA, 1997),页532。

② 让·凯约《法兰西画报》1952年9月21日,页280。

③ 弗朗西斯·让松《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现代》1952年4月号,页2070。

④ 雷蒙·阿隆(1905—1983),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上属右翼自由主义,代表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等。——译注

⑤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Boston, 1957),页51。

即反击以一尖刻、冗长的两篇答复以后,加缪和萨特从朋友变为敌人。

萨特—加缪的交往在加缪这边始于1938年,在萨特这边始于1942年,两人激动地发现了对方的早期作品,1943年两人第一次见面,这段友谊便匆匆开始了。由于哲学和政治思想上的接近,两人讨论过各种各样的合作,有着相似的抱负。法国解放前后,他们经常出双入对,存在主义到战后盛极一时,他们也渐成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为了避免被视为萨特的同门兄弟,加缪几次三番想摆脱加在他头上的标签,而他的朋友却把他作为新的介入理论的样板。两人都是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走的道路也两相平行——加缪做了《战斗报》的主编,这是一份抵抗运动报纸,后来成为巴黎的一份日报;萨特则是《现代》杂志的创始人和主管人,它很快跃为法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期刊。

在继续投身社会活动的时候,他们非共产主义左派立场因东西两极对立而出现了紧张。1946年秋天,《正午的黑暗》和《瑜伽修行者与政委》法文版问世以后,激进的反共分子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①的到来,把丘吉尔年初用“铁幕”演说宣示的对立带进了他们的圈子之中。库斯勒其人及其思想给所有人提了一个要求——明确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共产主义。

这些压力随此后几年历史局势的变化而得以增强,并在萨特和加缪的作品与他们正在成型的政治立场中打下了烙印。早些时候,萨特和加缪的作品中能够分辨出一种对话,虽不指名道姓地提到对方,但两人都在根据与对方的关系塑造自己的思想。虽然经常被扯向相互对立的方向,但他们仍然是朋友,他们继续尽其所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第三力量”——伴随着他们个人的成长,差不多一直要到冷战愈演愈烈,最终强加下拥共/反共的抉择的时候。他们的友谊延续到爆发的

① 阿瑟·库斯勒(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著有小说《正午的黑暗》等。——译注

那一刻。然而两人开始疏远、争吵,直至加缪逝世。

这是一个迷人的故事。为什么过去没有人完整地叙述过? 只有一两个简单的介绍, 一批作家研究过加缪和萨特之间的主题,^①但是没有一个人详尽地叙述过这段友谊的始末。为什么仍然有必要写这样一本书, 在它描述的事件过去 50 年之久后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直到最近这项工作才有可能进行。如今材料不再匮乏: 各种传记、专家审定的原著文本、不同方面文献的细心解读, 以及对许多生平方面和文献方面的疑问的周详调查, 这一切都给我们创造了条件, 使我们可以对这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将看到他们当初如何相互靠拢, 他们最初的道路如何接近并相互补给, 他们怎样以**书面形式**互相影响, 包括对对方作品直接和间接的评论, 他们的写作怎样涉及相似的问题, 他们的政治、文学 and 知识目标怎样互相交叠, 以及他们如何开始公开反对对方, 在关系破裂之后, 他们是如何在事实上继续互相角力、对答、叫阵。

但讲故事所需的不仅仅是材料的积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 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基于一个更根本的因素: 冷战本身。它需要所有人在一场正义反对邪恶的激战中选择立场——萨特和加缪殊途同归地沦为它的受害者——这把他们的冲突变成了一出纯粹的伦理剧。不管哪一方对, 另一方皆必错, 故事的结局没有任何分别。所以没有人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故事叙述完整, 并不足为奇。

作为冷战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萨特—加缪关系需要用党派的眼光来审视。故此, 萨特的终生伴侣, 在两人断交后写了很多文字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就很难客观地勾勒加缪的形象, 而不带有个人看法。《战斗报》的一个“小暴君”, 一个陷入“抽象的愤怒”和“道德

① 关于这个题目, 最佳的短论之一是伊安·比肖尔的《加缪反对萨特: 二十年之后》, 大卫·H·沃克编(1993年3月25—27日基尔大学讨论记录)。比较长的研究包括热尔曼·布雷《加缪和萨特: 危机与介入》(New York, 1970); 彼得·罗伊尔《萨特—加缪论战》(Ottawa, 1982)。

准则”的人。由于“无法妥协”，他成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个越来越顽固的拥趸”。被反共产主义妖迷心窍，加缪成了可疑的“伟大原则”^①的一名信徒。如果萨特的抉择是正确的，而加缪是错误的，那就是（根据波伏瓦的说法）正义的胜利和邪恶的失败。这种说法在萨特和波伏瓦的有生之年十分流行。随着后冷战时期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另一种观点兴起了。按一位加缪信徒的话说，“萨特……宣布他无论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加缪拒绝加入那些时兴的激进大众，他们是跟谋杀犯作交易的人；因此，他遭到萨特主义者的嘲笑和侮辱，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萨特主义者。”通过这种重释，共产主义的倒台如今使我们得以进行历史翻案，为加缪平反昭雪，他“有着两眼各 1.5 的政治视力”^②。

问题在于，体会历史，并把历史看作一场道德戏剧，就无法体会并洞悉它的模糊和悲剧之处。“悲剧”一语传递出了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我们将会看到，加缪和萨特的故事的结局对个人和历史而言都是很可悲的。这并非否认萨特在关系破裂的时候表面上的平静如水，也不否认他后来对这种关系和绝交轻描淡写。不过，在他后来的一篇最发人深省的访谈中，萨特谈到了加缪，“他是我最后一位好友”^③。不必对此话诧异不已，想想他们的一些出发点是多么相近，他们的战后任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们曾如此轻易地化解了阶级背景和脾气上的鲜明对立，何况他们还在一起度过了这么多快乐时光。然而，我们没有任何萨特的直接陈述，我们只能推测这场争斗对他有几分意义。但是毫无疑问，它强烈地影响了加缪。它使他沉寂。它是一团笼罩在他最后的岁月上空的阴云。他表现出痛苦，一种被背叛感，甚至因觉得他的

① 波伏瓦《时势所迫》（New York, 1965），页 106—112。

② 语出洛特曼《阿尔贝·加缪传》，页 XM—XV；有改动。这个术语在贝尔纳·昂利·莱维《萨特的时代：哲学研究》（Paris, 2000）和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伦·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Chicago, 1998）中有所阐发。

③ 萨特《七十岁自画像》，《生活·境遇》（New York, 1976），页 107。

遭遇是一场公开侮辱而感到蒙羞。他对此耿耿于怀,将其诉诸于一本小说,这就是在加缪 1960 年罹于车祸后,萨特在悼文里所说的加缪著作中“也许是最精彩也最费解”^①的那本《堕落》。

我想通过“悲剧”一语,超越冷战派系观这种派系观和其他许多因素一起,扭曲了人们对萨特—加缪之争的体会。我想怀着理解、同情以及批判描绘这一对对手。这意味着正确评价争执**每一方**根本上的正当性。萨特和加缪不是因个性不合而分开的。用萨特后来的术语说,他们的分裂是因为他们成了 20 世纪两大对立意识形态之间的世界—历史之争的“化身”。虽然加缪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萨特也从来没当过共产党人,然而这两个对手最后代表了比自身大得多的力量^②。多年以来,两人一直在抵抗逐渐逼近的分裂的威胁,同时又以会促成分裂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挑起和回应历史事件。一种历史主义逻辑催生了论争:萨特和加缪必须尽他们所有既枯燥又利己的不真诚避开姓共和姓资的陈词滥调,努力阐明思想者们——致力于谋求最大限度的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知识分子——支持或反对共产主义的根本理由。

两人分裂以后,令人失望的“非此即彼”论在左翼阵营里甚嚣尘上:支持革命运动和革命政府就意味着践踏自由;捍卫自由就意味着反对惟一重要的挑战资本主义的计划。更深一层而言,我们在讨论 20 世纪左翼的失败,它的希望的崩溃。一代人走向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希望必将毁于一旦。人们被迫作出不可能的选择——在萨特的严酷的辩证法现实主义(共产主义是通往实质变革的必由之路,而这种变革又如此丑陋)和加缪从有原则的左派立场出发对共产主义的抵制(这使得他无法认同任何重要的变革力量)之间。那种后来成为左翼的灾难——不单在法国,更是世界范围内的——的东西,被萨特和加缪用

① 萨特《阿尔贝·加缪》,《处境种种》卷四(Paris, 1985), 页 127;《处境种种》, 页 109。

②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卷二(Paris, 1985); 参见罗纳德·阿隆森《萨特的第二卷批判》(Sartre's Second Critique, Chicago, 1987), 页 51—75。

半对半错、一半真理一半谎言的话语铿锵有力地表达了出来,这种灾难至少持续到了下一代。

加缪和萨特坚持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表现在他们的剧作《正义者》和《魔鬼与上帝》里,在加缪的反抗者和萨特的革命者身上。但是,不管他们选择资本主义自由还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结局不单是相互对立,而且还反对自己。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论他们怎样说服自己,也不论论据何在,萨特、加缪以及他们的那一代人,都背叛了自身和他们的最高价值。

从他们绝交直到相继去世,两个人都把对方视为自己选择的道德剧中过于简单的术语:两人惟一共同认可的背叛都是对方一手制造的。对加缪而言,积怨的爆发表明了萨特从来就不是他的朋友,在政治上,萨特和围着他转的那些人有一种浓厚的奴役趣味。对萨特而言,加缪停滞不前,背叛了与他的历史世界的重要联系——这种联系在战时和战后使他魅力无穷。在他们轰轰烈烈地绝交以后,就像一场痛苦的离婚那样,两人似乎都在持续试图把对方永远驱逐出自己的生活——一个持续到1960年,另一个持续到1980年,他们仿佛在合力抹去友谊留下的一切痕迹。

萨特和加缪的传记作家和研究者们曾经是他们的同谋。一些人把他们的关系看得无足轻重,一看开头就能料想结尾。毕竟,他们的哲学、性情、文学风格以及社会出身,不都表现出了本质上的歧异,友谊只是偶然发生的吗?这种做法似乎就是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①所谓的“事后诸葛”。既然友谊以散伙告终,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从一开始就瞄准这段关系中“散伙的规律”^②。就像审视一段失败的婚姻那样,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分裂的逻辑必然性,似乎两

① 多丽丝·莱辛(1919—),英国当代女作家,著有小说《金色笔记》、《野草在歌唱》等。——译注

②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New York, 1962),页227—229。

人一定会一刀两断,也只有这样才有意义似的。而且,萨特和加缪两人似乎都在全身心地沉浸在那种导致他们分手的选择之中。两人押下了所有本钱赌自己正确,使得他们在他们的关系中只能看到绝交的一面,别的一无所有。分歧既存,后来就只是被冷战强加的机械的是非判断,以及再后来,被加入这个人或那个人的阵营以支持自己的一派的各路作者所一再强化而已。这样一来,其他传记作家和学者无法不在不把或萨特或加缪看作自始错误的情况下,观察萨特—加缪关系。据说,两人早期的相互批评,或他们的政治介入之路,或他们最早的重要作品,已经显现出两人真实的颜色^①。

他们命定要分道扬镳吗?不管他们后来怎样看待他们的友谊,在他们情况最好的时候,他们本来都可以抵制那种任何关系从开始的一刻起就走在向终点的看法。事实上,萨特还长期反对这种宿命论,称之为不真诚。两人的作品和生活要求我们读他们的故事——仿佛双方注定要经历的故事——的时候,带着一种对可能发生的事的开放性的心态。为了公正评价他们心目中的关系,我们必须通过他们对不可预知、选择、自由和荒谬的共同体来加以观察。

若非如此,就会忽略这段关系中完整、丰富的戏剧内涵,我们只会得到一个被严重歪曲的短篇小说,据此,加缪和萨特之间的欢乐转瞬即逝,根本谈不上友谊;他们没有相互影响;他们的联系是肤浅的,没能维持多久;他们的分裂也是在所难免的。甚至波伏瓦的陈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官方”的说法——至少是一面之词——也没有脱离这种模式,事实上,还确立了这种模式。但是,找到并试图拼凑起一个迷人、痛苦的真实故事,意味着要把这种关系置于中心位置。一旦得到它应得的位置,它将展现出一整套崭新的、迥然不同的意义。萨特

① 对加缪的负面评价见约翰·杰拉西《让-保尔·萨特:被憎恨了一个世纪的良心》(Chicago, 1989);对萨特的负面评价见奥利维耶·托德《阿尔贝·加缪传》(New York, 1997)。

和加缪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吸引,深刻的相互影响,相互卷入对方的私人生活并为此争吵,在绝交很久以后还互有纠葛。萨特在写给被他疏远的友人的悼文中说的“分裂正是另一种共处的方式”^①,绝不仅仅是一句漂亮话而已。

可笑的是,仅仅由于我想把故事讲述完整,且不想选择立场,这部加缪—萨特传就已经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历史了。我的论点——第一,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坚固有力的,第二,是冷战扭曲了这种关系,如它经常表现的那样——建立在坚实的论据之上。理解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时代,需要研究加缪的报纸《战斗报》、共产党周报《行动报》和前抵抗运动和同路人刊物《法兰西文学》,以及《人道报》和《世界报》的档案。现在有七本传记,对我们了解这两个人至关重要。它们提供了关于两位作家的生平和交往的材料,包括奥利维耶·托德搜集的关于加缪的许多新的个人情况,约翰·杰拉西做的萨特专访,以及安妮·柯亨—索拉尔关于加缪—萨特亲切感的洞见。而波伏瓦,即使不可避免地怀有党派偏见,但就她用回忆录里两卷多的篇幅讲述的官方版本的故事而言,就戴德尔·拜尔写的传记提供的访谈及其他信息而言,就她与内尔森·阿尔格伦的通信而言,她仍是不可缺少的见证人。而且,波伏瓦也写了一本反映战后年代的重要小说:《名士风流》;她收集了萨特和她自己的许多信件,为我们提供了1973—1975年间与萨特的谈话。萨特1975年与米歇尔·孔塔的谈话也具有启发意义,而孔塔和米歇尔·莱巴尔卡收集的成千上万有关萨特的细节则是不可或缺的。我还借助了许多罗杰·纪尧在七星版两卷文集中如实汇编的加缪的材料,以及加缪的三本笔记和他写给老师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②的信。

① 萨特《阿尔贝·加缪》,页109。

② 让·格勒尼埃(1898—1971),加缪的哲学启蒙教师,终生的良师益友。——译注

尽管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必需的,但它们并未告诉我们故事的关键所在。我对两人相互重要性的强调并非来自加缪和萨特在种种场合下有关他们关系的言论,或是来自波伏瓦——毋宁说是来自一个鲜有人注意到的主要根源,一个不带回顾性偏见的根源:萨特和加缪本人已出版的作品。我不但是指他们相互二十次左右地提到对方,更是指他们不指名道姓发生接触的那许多场合,其间他们就很多问题展开讨论。

萨特和加缪活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的作品是两人关系的故事的主要来源。从1938年到1960年,两人为对方而写,为评价对方而写,为回应对方而写。他们的书面接触产生了两人各自成长历程中的一些重要时刻。他们经常直接提到对方:起初加缪评价萨特的《恶心》和《墙》;然后萨特分析了《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有时候他们用暗语交谈,特别是在绝交以后。他们经常用那种需要我们从特定环境出发辨别其所指的方式提到对方。加缪频频与亲共左翼知识分子辩难,他认为萨特是1952年以后他们的领袖。1952年以后,萨特攻讦非暴力的信徒,把加缪看作这些人的代表。这种交往持续了二十年,起初是情同手足,后来是唇枪舌剑,用适当的方式阅读,将会读出许多有关两人关系的讯息。虽然还有许多其他资源对于叙写加缪—萨特合传有所裨益,但是这两位20世纪顶尖思想家仍是通过作品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现在,让我们聆听吧。

目 录

鸣 谢 / 1

引 子 / 1

第一章 初遇 / 1

第二章 占领、抵抗和解放 / 23

第三章 战后的介入 / 53

第四章 加缪的转折点 / 87

第五章 萨特的转折点 / 127

第六章 暴力和共产主义 / 157

第七章 爆发 / 181

第八章 料理诸事,做些实事 / 215

第九章 寻回他们的声音 / 245

第十章 禁闭 / 289

第十一章 尾声 / 317

后记 / 330

加缪重返蒂巴萨(译后记) / 336

第一章 初遇